



[法]阿兰·贝尔古尼欧
吉拉德·戈兰博格/著
齐建华/译 胡振良/校

法国社会党与执政的关系非常独特，一方面它在不断融入法国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又不肯因融入带来的后果而改变自己的理论和原则。该党特有的政治物。由此，产生了非常特殊的起伏变化过勃勃”，之后又退到源头，拒绝对理论做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梦想与追悔：

法国社会党与政权关系100年(1905—2005)

L'ambition et le remords: Les socialistes français et le pouvoir (1905-2005)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编委会

顾问：殷叙彝 主任：王学东

成员：王学东 张文成 刘庸安

贺和风 林德山



[法]阿兰·贝尔古尼欧
吉拉德·戈兰博格/著
齐建华/译 胡振良/校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梦想与追悔：

法国社会党与政权关系100年(1905—2005)

L'ambition et le remords: Les socialistes français et le pouvoir (1905-2005)

L'ambition et le remords by G. Grunberg and A. Bergougnoux

Copyright © 2005 by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SA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7)第5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想与追悔: 法国社会党与政权关系 100 年(1905—2005)/

[法] 贝尔古尼欧, [法] 戈兰博格著; 齐建华译; 胡振良校.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3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229-05444-1

I. ①梦… II. ①贝… ②戈… ③齐… III. ①社会
党—党史—研究—法国—1905~2005 IV. ①D7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1835 号

梦想与追悔:

法国社会党与政权关系 100 年(1905—2005)

MENGXIANG YU ZHUIHUI:

FAGUO SHEHUIDANG YU ZHENGQUAN GUANXI 100 NIAN (1905—2005)

[法] 阿兰·贝尔古尼欧、吉拉德·戈兰博格 著

齐建华译 胡振良校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刘 玮

责任编辑: 徐 飞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公司·蒋忠智 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1.5 字数: 512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444-1

定价: 4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总 序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分化、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社会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 1848 年革命前后,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派别大体分为三类: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前两个派别主要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把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那些社会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后者则以布朗基派为代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参加并领导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有时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和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中越来越多地采纳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逐渐取得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同义语。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左派与右派、中派彻底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则重新联合起来，维持原来的名称并明确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出改良主义的解释。此后，原来在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变成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对抗。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与左派的革命理念决裂而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而社会民主党人为了突出自己与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对立，开始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继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并开始了通过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实践。

二战结束后，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及其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目标，并开始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与19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日益发展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已经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党已普遍认同了现行社会体制，作为体制内的合法政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成为欧洲中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西欧多数社会党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执政经历，有的党甚至长期连续执

政。它们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扩大国家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力量 and 影响达到了高峰。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了。面对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整体衰落的趋势。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政党陆续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其特征是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和税收政策,限制工会权力,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

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征候更加明显。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急剧减少,而且理论上迷惘退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但实际上现在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已很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更偏爱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我们这套丛书所收著作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念的变化反映了西欧社会党力图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而此时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理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其目的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使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决裂,抛弃一切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整体性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或“现代化”成为西欧社会党转型的主题词,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纲领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型很快为西欧社会党带来了回报。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西

欧各国社会党陆续走出政治低谷,进入了一个政治复苏期,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有一些社会党相继下台,仍旧执政的党则面临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难题,特别是如何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难题。

20世纪末以英国工党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应提法是“新中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目标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老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反对新右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让经济富有活力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它的成败得失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由各国社会党的实践来证实。

总而言之,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历史性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尽管有一些社会党或党的领导人迄今仍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是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从总体上看,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科学性,只抽象地设定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反对提出任何全面的制度替代方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把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变革社会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所谓的“人民党”。

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性的区别,但是从广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

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它虽然不再追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制度替代,但仍旧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它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仍旧力求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通常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尤其是二战以后,它们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推动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外,它们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其他社会思潮中有价值的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政治竞争战略和执政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最近 20 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的研究,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译著,其中有一些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1987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 5 种);1994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未来的社会主义》;1996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8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和译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1999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和专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2001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2007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比我们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学术界对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选编了这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主要从两类著作中进行挑选。一是选择从总体角度探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变革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二是选择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一是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在学术界或欧洲社会党内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作者都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所以书中会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

王学东

2007年12月25日

序 言

法国社会党与执政的关系非常独特，雄心壮志与后悔莫及两种状态不断混合纠缠在一起，构成法国社会党相关的个性。这一点可以追溯到 1905 年该党实现统一的过程。

当时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都拒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执政，他们的奋斗目标准确地讲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党人与政权的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麻烦。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仅仅为法国所特有。后来几十年间，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曾承担过国家管理的责任，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民族的传统。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执政主要依靠其对工会的特殊影响，有时（如在比利时）也借助对合作社运动的影响；在意大利、尤其是在法国，社会党主要依靠其市镇影响的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是改造社会，党的行动应该针对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因此，在思考和处理党与国家政权关系上，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大家庭里都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感到某种困惑。

这种困惑来自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身份本身。凡是在真正的政治运动中诞生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都经历了影响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三大政治潮流和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历练或冲击，即代议民主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其他的党一样，法国社会党一经统一，就希望自己既是一个民主的党，利用和尊重普选和议会制度，同时又应该反映和尊重工人阶级的政治意愿，活动不能只局限在选举和议会活动的范围。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党必须既是民主的党，同时又是工人的党。此外，社会党还要面对第三种强大的政治潮流，这就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它要求社会党人接受代议民主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从事其主要活动，而当时工人运动的行动目标却是国际的。

每个社会主义党都要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根据党在政治和社会活动领域中的处境，来处理由于党面对这三大历史潮流所持的态度而带来的

紧张关系和局限性。但是，所有社会主义党都遇到了一股普遍的潮流或动力，推动他们要么逐步地完全融入本国的政治体系，并最终在他们原则所谴责的体系中执政，要么拒绝这种融入，经过一系列分裂，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多数派或少数派。法国社会党的特殊性不在于避免了民主社会主义面对的总潮流和问题，而是它处理融入体制问题的独特方式。

建党100年来，法国社会党在融入政治体系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矛盾，而对于党的活动分子来说，所感到的又是那么的令人不满，甚至是痛苦。法国社会党，比欧洲其他兄弟党更长时间地拒绝承担国家政权的责任，之后，他们开始执政，但执政的经历对他们似乎意味着一系列的反悔和背叛，每一次新的执政终结后，他们都要重新强调自己认同的所谓党的真正身份，也就是“决裂”而不是妥协，并反对修改其任何理论去适应实践。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党则是更大程度、更理论化地、更容易地接受了为党的根本原则和自由主义民主原则所兼容的相关调整。

本书提出了一种对法国社会主义这种“例外”的解释模式。其目的并不在于评判是非，也不在于提出建议，而是去尝试理解。社会党自建党之日起，而且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政治循环过程。这其中一定存在着足够充分的理由。意大利政治学者安吉洛·帕内比安科在研究各国政党时使用了基因模式的概念，他指出，认识一个政党处理内部和外部关系的稳定方式，关键在于研究其建党时期^①。我们正是运用这种方法，试图揭示法国社会党的基因模式。在我们看来，这一模式的形成是在1905年环球大厅法国社会党完成政治统一到1908年图卢兹会议上饶勒斯实现所谓“综合”的这一时期。建党时期影响了法国社会党的全部历史，而且其影响至今依然。正是在建党过程中锁定了党接受和融入国家政治体系的特殊方式。我们认为，无论社会党在法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变化（这些年来党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它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依然是在建党时间形成的那种关系。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依然存在着长期不变的一系列特征，正是这些方面特征构成了社会党与政权独特而连贯的关系。

法国社会党一方面在不断融入法国政治体系，另一方面又不肯因融入带来的后果而改变自己的理论和原则，该党特有的政治动力学正是这种长期紧

^① Panebianco (Angel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8.

张关系的产物。由此,产生了非常特殊的起伏变化过程,既向权力靠拢,表现为“雄心勃勃”,之后又退到源头,拒绝对理论作任何修正,体现出“追悔莫及”。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党与政权的关系在历史上没有经历任何深刻和持续的变化,事实是恰恰相反。这也正是为什么本书按四个时期分为四个部分的理由,而每一时期都反映出社会党人在与政权关系上情况的变化。

第一个时期从党 1905 年实现统一到 1936 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这一时期以**拒绝执政**为标志(1914—1917 年社会党人参加神圣同盟政府的极为特殊时期除外)。第二个时期从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到 1971 年密特朗掌控社会党权力为止。这里社会党初步经历了执政实践,也引发了幻灭和对**执政的追悔**。第三个时期下限至 1994 年底密特朗时代结束。这是**雄心勃勃和全面执政**的时代。最后一个时期是目前**不稳定的权力关系**时期。其间包括若斯潘当政及其失败,这一时期下限暂时划到 2005 年法国就批准欧盟宪章举行的全民公决。这四个时期法国社会党都经历了类似的由三个政治发展阶段构成的政治循环:以某种理论为标志的创建或再创建阶段;执政期间或多或少,或大规模地或小范围地与政治体系进行妥协的阶段;感受到妥协政策的失败和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放弃阶段。

本书之前的一个版本是《对权力的长时期追悔》。1991 年,我们在即将完成该书时,第三个时期就要结束,由于密特朗时期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党与政权的关系,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分析模式产生了怀疑。这一时期结束时,社会党在获得两次议会多数并加入欧洲社会主义进程后是否最终会修改党的理论呢?或者说法国“例外”会不会持久存在呢?自那时起发生的一切,促使我们在思考 1995 年开始的新阶段的同时,重新审视我们模式的合理性,不幸的是,1997—2002 年期间得出的结论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模式仍然有效,在重新开始本书写作之时,我们应该比前一本书更集中地思考权力问题,更具体地说明我们的模式。对 1995—2005 年时期的观察坚定了我们这样的直觉:虽然社会党经受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但法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依然最适合用基因模式的概念来解释。这里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又是困难的问题:这个模式持续的适应性是否应归功于从生物意义上理解的真正基因特性呢(初始特质不可改变)?在社会党的百年发展进程中,党创建时的外在和内在条件是否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颠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指出我们研究方法与其他有关政党的理论研究方法的的不同,别人强调的是在政党组织与他们所属的社会体系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它们强调把政

党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是不合适的。然而,我们即使把“法国社会党”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就这样的政党进行研究的特定对象时,也必须把社会党重新置于它所在的政治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的环境之中;尤其要研究它与法国左翼和左翼文化的关系,而且还要从更为宽阔的视角——我们在这里做得还十分有限——即它与法国政治文化的关系上去研究。法国政治文化特征既表现为以国家集权、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经济和企业精神相对淡漠,以及对金钱和利润的否定态度,也表现为个人主义以及与权力的对立,表现为组织文化的薄弱、重视演讲、崇尚法国革命传统和突变的价值等等。

我们的假设是,法国社会党基因模式之所以没有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段内,法国政治和文化环境即使在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各种变化,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们必须从法国左翼这个总体框架来研究这种不变;若不了解这一点,相关的研究就会打折扣。

目 录

Contents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总序	/1
序言	/1

第一编 拒绝执政(1905—1936)

第一章 法国社会党的原始特点	/3
第二章 统一的脆弱性与饶勒斯的综合	/42
第三章 让党“回避”权力	/64

第二编 追悔执政(1936—1971)

第四章 拒绝修正	/100
第五章 执政考验与难以解决的联盟问题	/123
第六章 不可能的“社会民主”	/155
第七章 挑战与危机	/176

目 录

Contents



第三编 执政梦想(1971—1994)

-
- | | |
|----------------|------|
| 第八章 埃比内的“中断” | /201 |
| 第九章 埃比内的继续 | /248 |
| 第十章 矛盾重重 | /275 |
| 第十一章 未做修正的改革 | /305 |
| 第十二章 法国社会中的社会党 | /328 |
-

第四编 前途未卜(1995—2005)

-
- | | |
|---------------------------------------|------|
| 第十三章 若斯潘的年代:密特朗色彩 | /349 |
| 第十四章 若斯潘年代:改革的尝试 | /360 |
| 第十五章 社会党危机:“传统”重新控制住“变化” | /388 |
| 第十六章 两难的政治抉择:从 2002 年的“意外”到 2005 年的震荡 | /412 |
-

结论 /427

附录 /443

参考文献 /456

MENGXIANG
YU ZHUIHUI

第一编
拒绝执政(1905—1936)

就政治传统而言,建党之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初建党时往往会尖锐地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1905年4月23、24、25日在巴黎的环球(Globe)会议厅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当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克服了内部分歧,组成了统一社会党。自那时起,它就是一个要持久地在法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党。这样一来,执政的问题,不仅成为理论讨论的中心,而且,由于大家都一致谴责社会党参加政府,所以也成为关乎社会党形成和保持统一的根本。本书第一部分致力于研究该问题展开讨论的情况,并说明为什么问题直到1936年事态的发展使社会党人初次“执政”之前都没有最终得到解决。

社会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它在法国社会和政治体系中遇到了各种牵制。1905年法国社会党没有能够成为左翼共和主义唯一的一个大党。党出现之前,共和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价值体系,形成了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体系,对此,社会党不得不考虑,要么加入,要么反对,或者有时是既要加入又要反对。社会党也没有成为一个最大的工人党,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社会党进入到统一的活跃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必须化解与工会运动越来越明显的分裂。1905年会议之后,1906年出台了《亚眠宪章》,用马德莱娜·勒白里尤的话说,提出了“另一种社会主义”。

这两方面的脆弱性赋予法国社会党一系列特殊的规定性,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图尔代表大会法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特殊的规定性就更为明显了。社会党时时感受到人们对它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心存疑虑,因此,他们尤为要不断强调1914年以前由让·饶勒斯提出并修订的党的理论。而这乃是社会党要想区别于其他政治竞争对手,无论是右翼激进党,还是左翼共产党的必要条件,也因此,拒绝执政成为保持其难得和迟来统一的必然后果。